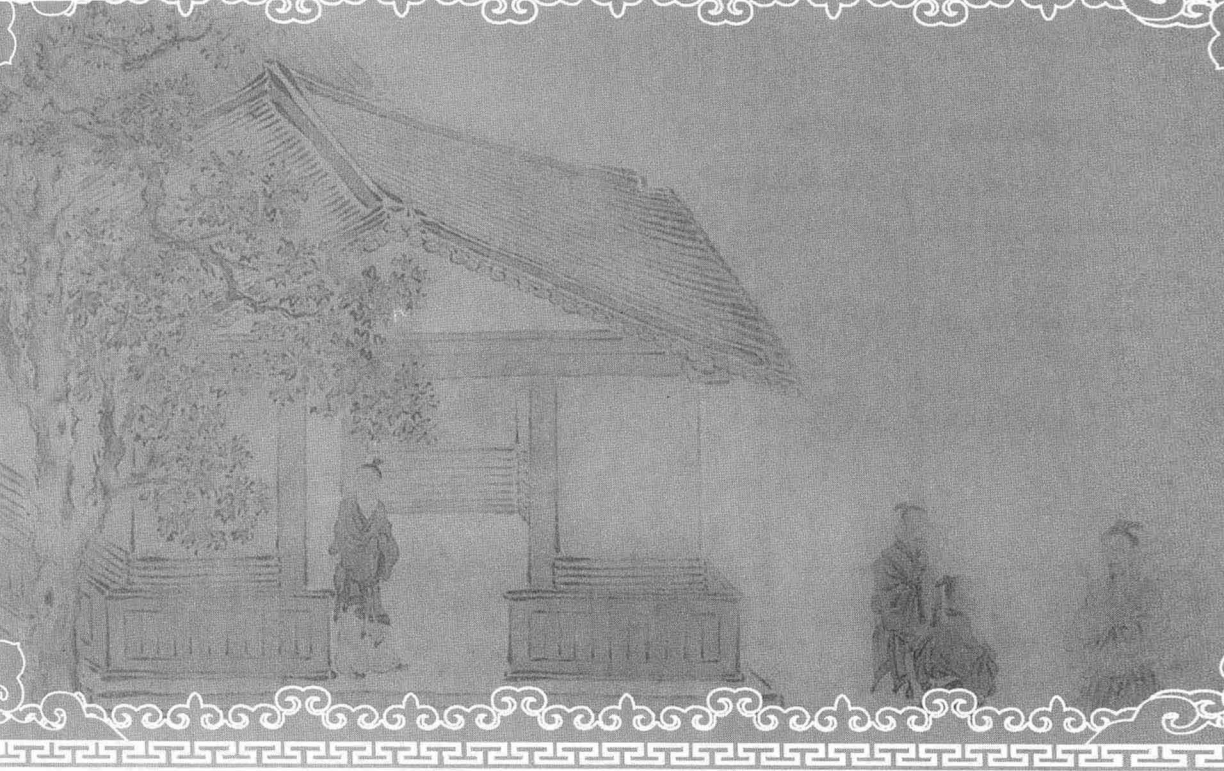




论《三百篇》与 春秋诗学

◎董运庭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论《三百篇》与 春秋诗学

董运庭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论《三百篇》与春秋诗学/董运庭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10

ISBN 978-7-5161-3178-7

I. ①论… II. ①董… III. ①《诗经》—诗歌研究
IV. ①I207. 2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05479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郭晓鸿
特约编辑 王 彬
责任校对 石春梅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64070619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7.5
插 页 2
字 数 296 千字
定 价 4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绪 论

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文献中，我们信得过而又最古老的书，唯有《诗经》。《诗经》是中国文化的元典之一。源远流长的中国诗歌和中国诗学，都以《诗经》为起点，它是当之无愧的中国文学的鼻祖。《诗经》收录了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的三百零五篇作品，这些作品都是优美的诗篇，也是周代社会生活的艺术表现，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和史料价值。

我们今天，谁都可以如数家珍地讲述《诗经》的一些内容，并用文学的眼光给予评论和鉴赏，但是，情况并非从来就如此简洁明快、一目了然。仅仅在一百年前，即 20 世纪初，《诗经》的真相还是模糊的，甚至扭曲的。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的感召，当时的一批学者用理性的精神和科学的方法去重新整理和评价中国的文化遗产，《诗经》才开始摆脱沉重的枷锁，获得新的生命。顾颉刚是一位将中国传统的治学方法与西方学术理念相结合，开启了新史学的方向，并对《诗经》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的学者。他曾有一座“古碑”来打比方，描述《诗经》在当时呈现给世人的面貌：

譬如一座高碑，矗立在野里，日子久了，蔓草和葛藤盘满了。在蔓草和葛藤的感觉里，只知道它是一件可以附着蔓延的东西，绝不知道是一座碑。我们从远处看见，就知道它是一座碑；走到近处，看它的形式和周围的遗迹，猜测它的年代，又知道它是一座有价值的古碑。我们既知道它是一座有价值的古碑，自然要走得更近，去看碑上的文字；不幸蔓草和葛藤满满的攀着，挡住了我们的视线；只在空隙里看见几个字，知道上面刻的是些什么字体罢了。我们若是讲金石学的，一定求知的欲望更迫切了，想立刻把这些纠缠不清的藤萝斩除了去。但这些藤萝已经经过了很久的岁月，要斩除它，真是费事得很。

等到斩除的工作做完了，这座碑的真面目就透露出来了。^①

这座矗立野外的极有价值的“古碑”，就是《诗经》。汉代以前，《诗经》并不以“经”名世，它被称为《诗》，或《诗三百》，或《三百篇》。那位讲“金石学”的人，就是作者自况，他怀着迫切的求知欲望，急欲斩除藤蔓、辨明真相，包括辨明文本的真相和史实的真相。那些“纠缠不清的藤蔓”，则是在漫长的岁月里的经学家们横加其上的歪曲、荒谬的诠释，因为在西汉以后的两千多年里，《诗经》的身份是“经”，而不是“诗”。所以这一项“斩除”工作，确实是极其艰巨的，其“费事”的程度，大大超出人们的估计。

顾颉刚为了把《诗经》的经历讲述清楚，他拟定了论文的题目：《诗经》的厄运与幸运。他的思路梗概如下：

所谓厄运是：（1）战国时诗失其乐，大家没有历史的知识，而强把《诗经》乱讲到历史上去，使得《诗经》的外部蒙着一部不自然的历史。（2）删《诗》之说起，使《诗经》与孔子发生了关系，成了圣道王化的偶像。（3）汉人把三百五篇当谏书，看得《诗经》完全是为美刺而作。（4）宋人谓淫诗宜删，许多好诗险些儿失传——此说若在汉代起了，一定发生效力。所谓幸运是：（1）诗篇有了一个结集，不致随许多逸诗一齐亡了。（2）汉人不当它是寻常的诗歌看，所以《汉书·艺文志》许多歌诗完全亡佚，而此巍然独存。（3）宋代欧、郑、朱、王辈肯求它的真相，不为传统的解诗所拘；虽然蒙蔽之处还是很多，到底露了一线曙光。（4）到现在，可以一点没有拘束，赤裸裸地把它的真相表显出来了。^②

“厄运”四项、“幸运”四项，二者并列，几乎已是《诗经》学术发展史的半部论纲；可惜他只做完“厄运”部分发表出来，就是《〈诗经〉在春秋战国间的地位》一篇长文。顾颉刚还发表了另一篇长文《论诗经所录全为

^① 顾颉刚：《〈诗经〉在春秋战国间的地位》，《古史辨》第三册下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309—310页。

^② 顾颉刚：《论〈诗经〉经历与〈老子〉道家书》，《古史辨》第一册上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53—54页。

乐歌》，^① 其结论亦当为不可移易之定讞。后因种种原因，他的《诗经》研究没有继续下去。至于“一点没有拘束，赤裸裸地把它的真相表显出来”的目标，远远没有达到。这不能怪顾颉刚，他是一位杰出的史学家，为解读《诗经》这座“古碑”打好了外围“攻坚战”；而后，该是中国文学史家和诗学家登场了。

说到诗学，人们往往不假思索地首先想到西方的古希腊。法国学者让·贝西埃在其主编的《诗学史》中说：“在诗学领域，人们几乎自发地引用希腊起源说。”^② 亚里士多德大约于公元前 335 年在雅典写成的《诗学》一书，是流传至今的最早以“诗学”命名的著作，它对欧洲以及其后世界许多国家的文学艺术的理论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一直被视为学术经典。但亚里士多德《诗学》所讲的“诗”，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诗”，概念并不一样。罗念生在亚里士多德《诗学》的《译后记》中说：“《诗学》原名《论诗的》，意即《论诗的艺术》，应译为《论诗艺》。”^③ 亚氏之书，主要是研究悲剧和史诗创作的问题，他的所谓“诗”，其实是泛指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学艺术，而且主要是指叙事性的文艺作品的创作。西方人著述亚里士多德而发展起来的文学理论和诗学理论，是产生于西方的语境中，带有自己的特定的问题意识和理论传统，未必能有效地解释中国的文化问题，也未必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

亚里士多德写作《诗学》的年代，大致相当于孟子的青壮年时代，其时已是战国中期。那时候，《诗经》早已结集完形，在社会上广泛流传和应用了数百年之久。而且，诗、乐早已分流，并已彻底分家；《诗》的应用也早已由乐章意义转向辞章意义，由基本上“以声为用”转向彻底的“以义为用”。也就是说，在那时，中国诗学已经有了数百年的发展历史，已然经历了若干个相互衔接而又性质不同的发展阶段。从先秦到晚清，中国古典诗学有着悠久深厚的传统，有更仆难数的优秀的理论著作，名家辈出，星汉灿烂。在这方面，我们比之于西方人，有值得骄傲的光荣，却没有任何自惭形秽的理由。但是，回眸往事，站在中国文学史和诗学史研究的“起跑线”上冷静反思，却不难发现有诸多歧误；迄今为止，这些歧误

① 顾颉刚：《论诗经所录全为乐歌》，载于《古史辨》第三册下编，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年版。

② 让·贝西埃等主编：《诗学史》，史忠义译，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5 页。

③ 亚里士多德：《诗学》，罗念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2 年版，第 109 页。

仍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在中国古代，对诗学有广义、狭义的不同理解。不过，大致来说，诗学的含义基本上就是两种：其一是关于《诗经》之学，包括名物训诂和诗义解说等；其二是关于诗歌之学，即关于诗歌的创作、鉴赏、评论等方面的学说。清代修《四库全书》，将前者归入“经部”的“诗类”，收入汉代鲁、齐、韩、毛四家诗说，直到清儒的《诗经》研究论著；后者归入“集部”的“诗文评类”，收入魏晋时期的《文心雕龙》、《诗品》等直至清人的诗话、词话、曲话等著作。两个系列的著录，皆可称卷帙浩繁，然而，先秦时期都是空白。因为，先秦时期虽有丰富的用诗解诗的文献记载，却无完整系统的关于《诗经》的研究著作保存下来。如果说，丛书编辑和目录学著作都必须以实有的文本为依据，方能收录或著录，那么，思想观念上的狭隘，则是值得商榷的。有学者认为：“先秦的《诗经》研究，从真正严格意义上说应当是从孔子开始的，因为在此之前的大夫赋诗以及周人的用诗并没有达到独立研究的意识，而只是把《诗经》当做公共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礼仪手段。”^①这种观念显然不是偶然的个别的现象，有学者在他讲授的中国古代诗学的著作中，就把孔、孟时代的诗学径称作“潜在的诗学”^②，意思恐怕是：孔、孟之前，就连“潜在”也算不上。由于这种较为普遍的、偏于狭窄的思想观念的支配，春秋诗学被抛弃在中国诗学史之外。实际上，春秋诗学是中国早期诗学的最重要的一页，却长期被埋没和遗忘。春秋诗学的缺位，导致中国诗学史起点的推迟和错认，也使中国诗学传统的梳理缺乏原初的、基本的素质依据，有可能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中国人对于“史”的理解，大抵是由司马迁的《史记》奠定其基础的。中国古代没有“文学史”的名目，也没有“文学史”或“诗史”一类的著作。直到清末民初，西方学术理论的输入，改变了我们的“史”的观念；又受到日本学者撰写中国文学史的启发，中国人撰写的中国文学史如雨后天晴一般涌现出来。诗歌向来是中国文学的泱泱大宗，自然在文学史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然而，时至今日，汗牛充栋般的中国文学史著以及数量不菲的中国诗史专著，仍然无力摆脱对于西方学术理念的“路径依

① 郁积意：《经典的批评——西汉文学思想研究》，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第137页。

② 参见王先霭《中国古代诗学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页。

赖”。其负面效应之一，就是以西方人对于社会发展和文学历史的“近代理解”为基础，把那些“不见经传，附会显然”的所谓“原始歌谣”确定为“诗之母”，也就是确定为中国诗歌的源头。实际上，产生在黄河流域这一片文化土壤上的中国早期的诗，不但有“歌”这个母系渊源，而且有“志”（即“史”）这个父系渊源。只有《三百篇》才是中国最早的可信的诗，除此之外，我们还找不到更早的可信的诗。中国诗之被称为“诗”，是以《三百篇》的诞生为其标志的。中国最早的诗，既不是案头阅读的韵文，也不是山民传唱的歌谣，而是配乐演唱的乐章古辞。歌辞，只有歌辞，才是中国古诗的“原生细胞”。创作于西周初年、残存于今的《大武》乐章，就是这种“原生细胞”的一个活的“标本”。中国诗的源头错认，导致中国诗歌与生俱来的文化基因难以锁定，理论上和认识上的无穷混乱无从消弭。

中国诗史的研究和中国诗学的建构，在“起跑线”上就陷入诸多歧误，显得步履维艰。我们曾经津津乐道“拿来主义”，我们曾经企望“别求新声于异邦”，一百多年过去了，现在看来，当初不设防地匆匆“拿来”的西方文学理论和诗学理论，普遍存在“水土不服”的现象。中国诗学理论体系的建构和发展，必须走进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阅尽人间春色”的文化心灵，决不能以丧失中国文化固有之血脉为代价。关于中国诗的源头追溯，闻一多当年写了一篇《歌与诗》的短文，^① 实际上是做了“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开创性工作，可惜嗣响寥寥，误读重重，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我服膺闻一多的说法，同时认为有细化和由此深入的必要，于是借刘勰《文心雕龙·乐府》中“乐辞曰诗”四字，作为本书上编的标题，盖以“乐辞”为基准，统摄我对《诗经》文本的一些思考。本书书名以《三百篇》为关键词而不径称《诗经》，其实并无深意，不过是想从名称上还原它在先秦时期的身份识别而已。

本书下编提出“春秋诗学”的概念，并主要依据《左传》、《国语》等古书的记载，对春秋时期用诗解诗的思想资料加以爬梳剔抉，刮垢磨光，以期通过梳理阐释，使春秋三百年间的诗学面貌初显轮廓。中国学术本是由“王官之学”转为“百家之言”，《诗经》之学则很特殊，到汉代它又被纳入“王官之学”的政策框架，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春秋诗学

^① 闻一多：《歌与诗》，收入《神话与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出现在西周和汉代这两种“王官之学”之间，又值诗、乐分流之际，《三百篇》的文化角色发生转换，在列国的政治场合与外交场合的频繁应用中，形成了独特的意义传达机制。当时的人们由于“唱得烂熟，听得烂熟”，所以有了随意使用它的能力而并不损害“诗的真相”。无论是春秋燕享赋诗，还是列国公卿引诗证事论理，在一定意义上说，当时的人们确是把《三百篇》中的作品当作类似于“生活教科书”和“语言艺术品”来看待和应用的。这个现象对于文学理论和诗学理论来说，非常重要，可惜长期被忽略，充其量只有一些就事论事的叙述。这不奇怪，因为过去全无春秋诗学的概念，所以，如此重要的诗学现象也就无所附丽，当然也无由得到理论提升。我认为，必须确立春秋诗学应有的地位，不应该让它成为一个被遗忘或跳过了的阶段；否则，中国古代诗学和诗学史的整体书写就不可能进行，至少是有严重的缺陷。我为此而做的工作，虽然微不足道，但我是怀着偿还“欠债”的心情来做的。坦诚地说，我认为这是对于我们远在春秋时期的老祖宗必须偿还的一笔拖延已久的“欠债”。

曩昔负笈求学，闻于业师曰：治学之道，须由校讎笺疏入于义理，无征不信。我对此深以为然，铭于座右，奉为信条。我在动手做春秋诗学的研究之前，首先完成了一项基础性的工作，就是为清人劳孝舆的《春秋诗话》作笺注。诗话之著，一般认为始于欧阳修《六一诗话》，到清代达到空前的繁荣。历代诗话，多论楚辞、汉乐府、《古诗十九首》以及前朝、本朝的诗人、诗作；因为《诗经》是经学，通常都不予涉及。唯劳孝舆《春秋诗话》能“于旧巢故垒中别开生面”，在传统《诗经》学之外为《三百篇》撰写专门的诗话著作，从而将诗话推到先秦诗学昌盛的源头，填补了此前先秦无诗话的空白。劳孝舆《春秋诗话》是研究春秋诗学的拓荒之著，书中确有不少真知灼见，而且提供了大量的春秋诗学的“样本”检测报告，足资后人参考。孰料，《四库全书总目》却给了它“殊无可取”四字评价，^①不啻当头一棒，使它长期遭受冷遇，流传不广。近年来，学术界转变了态度，关注和征引它的人越来越多。我的《春秋诗话笺注》，也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它与本书可以相互参照。

自愧学殖浅薄，读书不多；疏漏谬误，知所不免。我的关于《诗经》的旧文二篇，附录于后，一并就正于方家。

^① 永瑤等撰：《四库全书总目》（下册），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806页。

目 录

绪论	(1)
----------	-----

上 编 乐 辞 曰 诗

第一章 《三百篇》与中国诗史的“源头”	(3)
一 文学史的输入与“诗”史溯源的歧误	(3)
二 中国诗史溯源的几种“路线图”	(7)
三 歌、诗二源与中国“诗”发展的三个阶段	(13)
第二章 乐章古辞:从《诗》到《诗三百》	(19)
一 传说周公“制礼作乐”与周人首创“革命”理论	(20)
二 《大武》乐章:《诗》的“原生细胞”的标本	(24)
三 《诗》文本的结构及其拓展与完形	(31)
第三章 “二南”探故	(37)
一 关于“王化之基”与“周、召分治”	(37)
二 周室经营南土与“南国”地域考略	(42)
三 《周南》《召南》何以区分及其与“荆楚风乐”之关系	(46)
四 《周南》《召南》为何列于《国风》之首	(50)
第四章 论“三监”与《邶》《鄘》《卫》“三国同风”	(54)
一 关于“三监”性质的纠结	(54)
二 关于“三监”人物的纠结	(59)
三 关于“三监”地域的纠结	(63)
四 关于邶、鄘、卫分编与分卷的纠结	(66)

五 以“三监”释《邶》《鄘》《卫》的历史反思	(72)
------------------------------	------

第五章 论“二雅”为周诗

——再读朱东润《诗大小雅说臆》、孙作云《论二雅》	(75)
一 从先秦文献引《诗》称谓推考“雅”之本义	(76)
二 关于“雅”、“夏”、“周”之考释辨析	(80)
三 二雅”多为西周晚期的诗	(85)
四 几点初步结论	(90)

下编 春秋诗学

第六章 “礼崩乐坏”下《诗》的乐章意义与辞章意义

——春秋诗学概观	(95)
一 “礼”与春秋诗学的社会文化背景	(96)
二 诗、乐分流:《诗》的乐章意义及其衰变	(109)
三 从乐歌歌词到《诗》的辞章意义的开发应用	(119)

第七章 闻弦歌而知雅意

——春秋燕享赋诗及其文化机制透析	(132)
一 春秋“赋诗”概念辨析	(133)
二 春秋燕享赋诗“全景”概览	(134)
三 春秋燕享赋诗的意义传达机制	(144)
四 关于“乱用”与“《诗经》的真相”	(149)

第八章 弦诵有素 诗作典用

——春秋时期列国公卿引诗证事考论	(152)
一 春秋时期公卿大夫引《诗》类型及分析	(153)
二 春秋公卿引《诗》与周代“礼乐文明”	(161)
三 列国公卿大夫引诗的意义关联原理	(166)

第九章 每有发论,假君子以称之

——《左传》叙事人引诗作史评考论	(171)
一 引诗以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之得失	(172)

二 引诗以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之是非	(176)
三 引诗以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合于“礼”与否	(181)
四 余论:几个相关问题的思考	(184)
 第十章 介公子以见古人	
——季札观乐考论	(188)
一 季札“观乐”感言的三个层面	(188)
二 季札“观乐”感言的价值讨论	(193)
三 关于吴公子季札其人其事	(200)
 第十一章 论“《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春秋诗学的一桩公案	(206)
一 比“瞎子摸象”更吊诡的盲目争执	(206)
二 《毛诗》内在的冲突	(209)
三 毛诗与三家诗的冲突	(213)
四 孔子诗说与传统《诗经》学的冲突	(217)
 第十二章 春秋诗学研究的拓荒之著	
——评劳孝舆《春秋诗话》	(221)
一 把“诗话”推到先秦诗学昌盛的源头	(222)
二 《春秋诗话》所遭遇的困境	(224)
三 劳孝舆生平事迹考略	(229)
四 《春秋诗话》的成就与不足之处	(232)
 附录	
悉信亦非 不信亦非	
——《诗经》学几个关键的再考察	(238)
从“六诗”到“六义”	(253)
 后记	(268)

上 编



乐 辞 曰 诗



第一章 《三百篇》与中国诗史的“源头”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乐歌总集，也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在它成为儒家的“六经”之一，进而成为西汉及以后历代封建国家官方意识形态的经典之前，被人们通称为《诗》、《诗三百》或《三百篇》。收入这部总集的三百零五篇诗，大致产生于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的五百年间^①，这些作品是中国最早的“可信的诗”。除了收入《诗经》中的诗篇以外，从现存材料看，我们还找不到更早的可信的诗。甲骨文、金文均无“诗”字，最早的“诗”字也出现在《诗经》里，因此，“《诗经》应是中国诗的源头”^②。中国诗之被称为“诗”，是以《诗》的诞生为其标志的。这个观念，迄今尚未得到清醒、普遍的认同，也没有得到应有的细化和透彻的阐释，关于中国诗史的许许多多的混乱和误读，因而大行其道。若不彻底澄清，不但中国诗的起源与《三百篇》的文化基因难以正确认定，而且，百余年来中国文学史研究先天不足的沉痾痼疾及其并发症，也无从根治。

一 文学史的输入与“诗”史溯源的歧误

在中国古代，诗的创作与研究有悠久的历史、光荣的传统和辉煌的成就。然而，对于中国诗歌源头的学理性的追溯与考察，却是肇始于20世纪初。具体说，是肇始于当时的学人受西方学术规范和学术话语的影响，以“文学史”的名义对中国文学的历史进行研究和书写的行为。中国诗歌的

^① 《诗经》作品的上限，因对《商颂》创作年代的不同看法，而有不同的界定。古文经学家以《商颂》为商人之作，故《诗经》上限应推至殷商时代；今文经学家以《商颂》为春秋时的宋诗。《诗经》下限为春秋中叶则无甚异议。近年来，《商颂》为商诗之说，渐为学界所接受。但《商颂》在《诗经》中所占比例很小，且《商颂》何以编入《诗经》，也有争议。故不宜因《商颂》的争议而影响《诗经》年代的基本认定。

^② 王文生：《诗言志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21页。

前生今世的辨认，既因“文学史”学术理念的介入而得到较为系统的梳理，也因其介入而发生断裂和歧误。

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文学”概念，所通行的“文学史”著述体裁，全都出产于西方，并经由日本而输入的舶来品，或者是，是这些舶来品进入中国后历经百年演进的产物。就连“诗”与“诗歌”，这样的语词当然为中国所固有，而其内涵也有一部分是外来的，或者说，是经外来观念修正过的。钱基博说：“中国无文学史之目。”^① 20世纪以前，中国只有书目提要、总集、别集、学案、文苑传、诗文评（含诗话、词话、曲话、文话）等，这些传统体裁的著述卷帙浩繁，它们用传统的学术语言和方式，著录、积累和解说古代中国文学，书写和记录着中国古代诗人和诗篇的成就和辉煌，以及它们源远流长的故事。

在19世纪中叶的欧洲，受当时发达的历史学科的影响，以民族文化观念为基础，以时代嬗替和源流承传为线索，按国别或地域描述并诠释作家、作品的文学史研究十分盛行。这种学术语言和研究范式很快传到亚洲，并以日本为中转站输入中国。外来“文学史”的叙述语言，本质上是对文学和文学历史的“西方式的近代理解为基础”的，^② 它所体现的近代西方学术思想的内在逻辑和学理准则。西方输入的这一套对文学的言说方式，与中国的学术传统有很大的差异，二者的对接起初是困难的。中国学者撰写的早期中国文学史著，也明显地表现出“水土不服”的症状。1904年，林传甲任京师大学堂教习，年仅二十岁的他以百日之速，匆匆写下一部七万七千字的《中国文学史》讲义，就是模仿日本汉学家《支那文学史》的体例下笔的。该书从古文、籀文、小篆、八分、草书、隶书，古今音韵、训诂之变迁，一直讲到群经文体。^③ 如此混杂不堪，完全是一个“杂货铺”。郑振铎给了他严厉的批评：“林传甲著的，名目虽是《中国文学史》，内容却不知道是些什么东西！有人说，他都是钞《四库提要》上的话，其实，他是最奇怪——连文学史是什么体裁，他也不曾懂得呢！”^④

① 钱基博：《中国文学史》（上），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6页。

② 参见戴燕《怎样写中国文学史——本世纪初文学史学的一个回顾》，载于《文学遗产》1997年第1期。

③ 林传甲：《中国文学史》，上海科学局发行，宣统二年（1910年）校正再版。

④ 郑振铎：《我的一个要求》，《郑振铎古典文学论文集》（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36—37页。

经过最初的纷乱与惶惑，移植而来的文学史观念和方法逐渐成活、稳定。于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逐渐疏离了固有的学术理念，基本放弃了传统的话语体系，出现全面调整、重新组建的格局，竭力去顺应西方文学理论的概念体系和话语范式。朱自清对此变局是这样叙述的：

西方文化的输入改变了我们的“史”的意念，也改变了我们的“文学”的意念。我们有了文学史，并且将小说、词曲都放进了文学史里，也就是放进了“文”或“文学”里；而曲的主要部分，剧曲，也作为戏剧讨论，差不多得到与诗文平等的地位。我们有了王国维先生的《宋元戏曲史》，这是我们的第一部文学专史或类别的文学史。新文学运动加强了新的文学意念的发展。小说的地位增高，我们有了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词曲差不多升到了诗里，我们有了刘毓盘先生《词史》，虽然只是讲义，而且并未完成，还有王易生先生的《词曲史》。民间的歌谣和故事也升到了文学里，“变文”和弹词等也跟着升，于是乎有郑振铎先生的《中国俗文学史》。这里要特别提出的是，在中国的文学批评称为“诗文评”的，也升格成为文学的一类。^①

朱自清的这段话，简直可以视为格局调整的“现场直播”和“跟踪报道”。朱自清所用的“升”、“跟着升”、“升格”等词语，也全是“进行时”的语态。传统观念中的许多“非文学”的内容，如典章制度、章句注疏、名物训诂、鸟兽虫鱼等，通通摒弃于文学视野之外；而历来地位相对低下的小说、词曲、诗文评等，则“升格”成为正统文学，民间的歌谣和故事也“升”到了文学里，这就是重新“洗牌”的结果。“摒弃”也罢，“升格”也罢，依据不是别的，纯粹就是按照外来的西方学术的理论框架、语义体系和概念系统，显而易见是对西方文学理论的“路径依赖”的产物。^② 新

^① 朱自清：《诗言志辨序》，《朱自清古代文学论文集》（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87页。

^② “路径依赖”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提出的阐释经济制度变迁的理论。其核心是：一种经济制度一旦形成，无论是“好”还是“坏”，都类似于物理学的惯性，可能使其后的制度选择对此种“路径”产生依赖。惯性的力量会使这种“路径”不断强化，让你轻易走不出来。诺思于1993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近年来，经济学研究也注意发展中国家经济制度的选择对“路径依赖”负面效应的规避。此理论逐渐对社会科学多个领域产生影响。